

黎巴嫩真主党与叙利亚关系探析

李福泉^{*} 申浪^{**}

内容提要 黎巴嫩真主党自1982年诞生以来，即与叙利亚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1982～1989年为相互警惕的磨合期；1989～2000年是真主党依赖叙利亚的联合期；2000～2011年发展成为平等伙伴关系；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至今，双方关系更为密切并发生了短期的角色逆转。二者关系的恒量和实质是彼此借重和相互利用，地区局势的变化则是关系演变的永恒变量。伊朗和以色列对这种关系的产生、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双方联合的事实对二者本身、黎巴嫩国家和地区局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只要戈兰高地问题存在、巴沙尔政府不被推翻、教派掩盖下的地区国家博弈持续，双方的复杂关系就会一直存在。

关键词 真主党 黎巴嫩 叙利亚 叙利亚内战

2013年5月，黎巴嫩真主党正式宣布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时至今日仍然活跃在支持叙政府的一线战场，成为除俄罗斯、伊朗以外直接支持巴沙尔政权的第三大外部力量。真主党与叙利亚的同盟关系也进一步在叙利亚内战中得到体现和加强。二者联合的现实状态也是双方关系演变的逻辑结果。30多年来，正是叙利亚政府为真主党提供不可或缺的政治支持，才使其从地区棋盘上的边缘角色一跃成为搅动中东地缘关系的重要力量。而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叙利亚政府坚持世俗主义，真主党信奉伊斯兰主义，二者分歧明显，差异巨大，但却彼此借重、深度合作，形成了战略联盟关系。这一关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厘清这一关系对于理解纷繁复

* 李福泉，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 申浪，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杂的中东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一 真主党与叙利亚关系的缘起

真主党诞生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之中，是在阿以冲突大背景下产生的秘密组织。^① 1982年6月，以色列以打击在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组织民兵为借口，入侵黎巴嫩并占领黎巴嫩1/3的领土，直接导致几万人的伤亡，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民众遭受巨大灾难，并产生了强烈的反以情绪。但奉行世俗化的黎巴嫩什叶派代表阿迈勒运动^②却企图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这引起阿迈勒内部伊斯兰主义者的强烈不满。此时，为实现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抵抗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前沿阵地的战略目的，伊朗急需在黎巴嫩输出伊斯兰革命。1980年3月，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在新年讲话中明确表态：“我支持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反抗以色列。”^③ 于是，以侯赛因·穆萨维（Hossein Mousavi）为代表的阿迈勒内部伊斯兰主义者，在伊朗的支持下另组“伊斯兰阿迈勒”，即真主党的前身和主要组成部分。

在伊朗推动真主党建立的过程中，叙利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叙利亚得益于对黎巴嫩主要陆地边界的临近和控制，使其有权阻碍伊朗与真主党的直接接触。1979年后，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就试图经过叙利亚进入黎巴嫩，但受制于阿萨德政府的反对而没有实现。但在1982年，叙利亚需要真主党的出现来为自身利益服务，阿萨德政府允许伊朗力量进入黎巴嫩扶持真主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行动使驻黎叙军蒙受巨大损失，借助伊朗的力量去反抗以色列入侵可以用最低成本间接弥补损失。其二，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由美国和欧洲组成的多国部队进驻黎巴嫩之后，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大马士革无

^① 胡耀辉：《黎巴嫩马龙派国家观念探析》，《中东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

^② 阿迈勒运动，全称为“黎巴嫩抵抗集团—被剥夺者运动”，在阿拉伯文中“阿迈勒”意为希望。该运动于1974年成立，创建人是什叶派宗教领袖穆萨·萨德尔。它的成员主要分布在黎巴嫩南部、贝卡谷地和贝鲁特南部等地区。实质上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基础的政治、军事混合体。

^③ Imam 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 (1941 – 1980)*, translation by Hamid Algar, Berkeley: Mizan Press, 1981, p. 276.

法与多国部队和以色列占领部队正面对抗，它需要依靠当地盟友来重建影响力，^① 而真主党的出现将为叙利亚增强在黎巴嫩地位发挥作用。其三，叙利亚戈兰高地的收复需要黎巴嫩什叶派对以色列的持续打击，更离不开伊朗的大力支持，取悦伊朗也可强化联盟体系。从叙利亚和伊朗的关系来看，叙利亚不仅是伊朗向真主党提供支持的必经通道，也是其打造什叶派联盟的重要一环。在两伊战争中，叙利亚坚定站在伊朗一方增强了双方的战略互信，什叶派的共同教派认同更是拉近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1982年伊朗军事官员访问大马士革进行协调之时，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明确表示允许伊朗武装过境。^② 于是，伊朗军事力量得以进入黎巴嫩并在叙利亚控制的贝卡谷地训练什叶派战士，宣传伊斯兰革命思想，真主党由此诞生。而叙利亚也为真主党战士提供训练和必要的安全保障。^③

与伊朗的战略期待不同，起初叙利亚并不希望真主党演变为黎巴嫩最重要的什叶派力量。相比具有长期合作基础与共同世俗化倾向的阿迈勒，叙利亚对以建立伊斯兰国家为目标，又是伊朗输出革命产物的真主党持怀疑态度。真主党的意识形态、伊朗的政治支持、独立的资源和严格的纪律，都使大马士革对这一新运动可能失去控制表示关切。^④ 而真主党之所以接受信奉世俗主义的叙利亚政府支持和帮助，除伊朗的影响和自身反对以色列的需要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生存需要。起初真主党并不愿接受叙利亚世俗政府的影响，只是鲜明的力量对比使其最终选择服从。^⑤ 真主党副总书记谢赫·纳伊姆·卡塞姆（Shaykh Na'im Qassem）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真主党的观点与叙利亚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很自然，因为没有人能幸免于以色列的野心，真主党与大马士革的关系不是强制性的或偶然的，而是基于地

^① Emile El-Hokayem, “Hizballah and Syria: Outgrowing the Proxy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7, p. 36.

^② Abbas William Samii, “A Stable Structure on Shifting Sands: Assessing the Hizbullah-Iran-Syria Relationship,”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2, No. 1, 2008, p. 35.

^③ Naim Qassem, *Hizbullah: The Story from Within*, translation by Dalia Khalil, London: Saqi Books, 2005, p. 240.

^④ Emile El-Hokayem, “Hizballah and Syria: Outgrowing the Proxy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7, p. 36.

^⑤ USIPeace Briefing, “Syria’s Role in Lebano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November 2006, <http://www.aljazeera.com/focus/lebanon/2007/07/200852517306599517.html>, 2018-08-10.

区现实，包括密切的德黑兰一大马士革关系，而且到目前为止已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和必要性。”^① 总之，没有叙利亚的支持和庇护，真主党的诞生或许要晚一段时间。实际上从一开始，二者之间就是一种相互利用、合作、怀疑的复杂关系。二者的联合，本质上反映了双方反以的共同战略需要和互相利用的现实要求。

二 相互警惕的磨合期（1982~1989）

真主党诞生后，叙利亚因其意识形态层面的伊斯兰主义和伊朗对该组织绝对的政治影响，长期保持高度警惕。首先，从意识形态来看，叙利亚崇尚世俗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主张建立现代国家，并反对宗派主义运动。^② 而真主党成立时是一个宗教团体，在伊朗的影响下致力于在黎巴嫩建立伊斯兰国家，这些构成二者相互警惕的先天因素。随着 1984 年 2 月美法军队因黎巴嫩局势的恶化而被迫撤出，以及 1985 年初以军被迫撤离黎中部地区，真主党的处境逐渐好转，其在黎巴嫩什叶派中的追随者也越来越多，真主党与叙利亚之间的矛盾不断暴露。真主党认为，驻黎叙军不仅妨碍了它的军事训练，也妨碍其拥有武器和自由行动。^③ 其次，从伊朗的政治影响来看，真主党是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重大成果”。而同为黎巴嫩什叶派代表的阿迈勒长期受到叙利亚的支持，其领导人同样坚持世俗主义，反对教法学家治国理论，也更靠向叙利亚，并在后者的支持下成为真主党的强大竞争对手。此外，从对待黎巴嫩政府的角度来看，叙利亚与真主党也存在明显差别。真主党拒绝承认黎巴嫩政府并呼吁推翻它，而叙利亚则对在教派分权制基础上形成的黎巴嫩政府持支持态度。最后，在巴以问题上的分歧为本就相互警惕的二者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叙利亚将阿迈勒作为遏制独立于自身之外的巴解势力的最佳代理人，而真主党却坚决支持巴解组织。在真主党看来，通过抵抗运动迫使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权益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途径。

而叙利亚反抗以色列、收回戈兰高地的强烈愿望，又使其寄希望于擅

^① Naim Qassem, *Hizbullah: The Story from Within*, London: Saqi Books, 2005, p. 243.

^② 王新刚：《叙利亚军人政治的历史演变、成因及特点》，《中东问题研究》2015 年第 2 期。

^③ [叙利亚] 肖克：《真实的黎巴嫩真主党》，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第 142 页。

长“不对称战争”的真主党。虽然真主党的存在是对叙利亚长期合作的可靠盟友阿迈勒的直接挑战，但阿萨德政府并不反对极端主义政党的存在。^①自1982年以来，真主党间接地为叙利亚加强在黎巴嫩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暴力行动，目的在于将驻黎巴嫩的西方多国部队赶出黎巴嫩，并向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施加压力。1983年5月17日，黎巴嫩杰马耶勒政府与以色列签署撤军协议，规定以色列将以叙利亚撤军为先决条件进行撤军。后在叙利亚和包括真主党在内的黎什叶派穆斯林的压力之下，黎巴嫩政府于次年3月5日宣布废除撤军协议。这标志着叙利亚在经过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行动导致在黎巴嫩地位的短暂削弱后，重新确立了自身在黎巴嫩的重要地位。

在1982年之后的五年，叙利亚和真主党之间的合作局限于安全问题的调解。随着真主党力量的增强，其对叙利亚的怀疑也日益加深。真主党一直保持领导工作的秘密性，以防叙利亚找到机会清除其领导层内的反叙人士。“1989年11月，真主党协商委员会选举苏布赫·图费利为第一任总书记，其领导人才第一次被外界所知。”^②而叙利亚起初也不愿同与穆兄会相似的组织展开政治合作。于是，在互不信任和相互猜疑的氛围之下，叙利亚与真主党之间的军事冲突在所难免：1987年，当叙军队在前往贝鲁特平息席卷黎巴嫩首都的骚乱过程中，遭到真主党武装分子的阻挠，双方爆发冲突的结果是23名年轻的真主党战士丧生。真主党要求报仇的声音此起彼伏，伊朗官方也予以谴责。真主党的一位专栏作家阿赫德（al-Ahd）质疑叙利亚进入贝鲁特西部的动机，并表示叙利亚在黎巴嫩的政策和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外国（尤其是美国）的交易。^③叙利亚军队也随之在贝鲁特进行严格的安全管控，局势面临失控的危险。在伊朗的强力劝说和利益协调之下，紧张局势得以降温，真主党决策机构“舒拉委员会”决定不采取任何报复行动。

伊朗和叙利亚之间的分歧也反映在真主党和阿迈勒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① Asad Abukhalil, “Syria and the Shiites: Al-Asad’s Policy in Leban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2, No. 2, 1990, p. 13.

^② 李福泉：《从边缘到中心——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140页。

^③ Asad Abukhalil, “Syria and the Shiites: Al-Asad’s Policy in Leban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2, No. 2, 1990, p. 15.

层面。当真主党与阿迈勒发生冲突时，其与叙利亚的紧张关系也进一步升级。1988 年 4 月，二者之间爆发的激烈冲突从黎南部一直蔓延至贝鲁特南郊，真主党与叙利亚的对立也达到了顶峰。冲突的后果让真主党意识到，必须通过伊朗这条联盟纽带才能与叙利亚达成和解，伊朗也敦促二者将双边合作从安全问题调解提高到政治合作的层次。德黑兰和大马士革都渴望恢复平静，他们担心冲突会对两国关系造成不利影响。^① 经过叙伊多轮磋商之后，由叙利亚、伊朗、真主党和阿迈勒四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叙利亚从政治上正式承认真主党，双方由此展开政治合作。1988 年 6 月，哈菲兹·阿萨德在大马士革会见了真主党代表团，这次会晤是真主党与叙利亚领导人的首次接触。叙利亚高级官员哈利姆·哈达姆（Halim Khaddam）也承认：“起初叙利亚和真主党的关系紧张，叙利亚驻扎在贝鲁特街区的士兵与真主党经常发生冲突，后来这种紧张关系逐渐缓和。”^②

总之，1982~1989 年，二者关系表现为相互警惕的磨合状态。由于真主党的伊朗政治影响和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二者之间呈现出鲜明的分歧和对抗，最终在伊朗的协调下实现从安全调解到政治合作的艰难转变。一系列的冲突对抗让伊朗意识到必须考虑叙利亚的利益，叙利亚也意识到控制真主党必须要与伊朗展开合作，真主党也明白必须在伊叙的庇护之下才能在黎巴嫩得到生存和发展。长达八年的磨合期体现出早期叙利亚和真主党之间利益交融又相互猜疑的现实状态，而协调结果是二者互相承认了对方在黎巴嫩的地位和利益，背靠伊朗又获大马士革“谅解”的真主党开始迅速崛起。

三 不对称的联合期（1989~2000）

1989 年 10 月签订的《塔伊夫协定》^③ 有效结束了黎巴嫩内战，也使叙

^① Jubin M. Goodarzi, *Syria and Iran: Diplomatic Alliance and Power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IB Tauris, 2009, p. 267.

^② [叙利亚] 肖克：《真实的黎巴嫩真主党》，第 145 页。

^③ 面对黎巴嫩危机，阿盟国家多次举行会议，商讨调解和解决危机的途径。1989 年 10 月 22 日，相关各方在沙特的塔伊夫市通过黎民族和解的最后妥协文件，后称《塔伊夫协议》。文件中要求叙利亚军队在两年内协助黎巴嫩正规军恢复主权。该协议被认为是当时形势下“唯一可以为各方接受的现实方案”。

利亚在黎巴嫩的政治霸权地位制度化。几乎同时，1989年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的去世和伊朗新政府对革命激进主义的“厌倦”，使伊朗外交政策开始务实调整，叙利亚由此能够更自由地在黎巴嫩施加影响。这两大因素使真主党依赖叙利亚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不对称的合作体系逐渐稳定。

《塔伊夫协议》重申了黎巴嫩教派分权制的权力分享结构，也要求所有组织必须解除武装。这不仅粉碎了真主党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理想主义目标，也意味着一个武装组织的终结。真主党面临艰难抉择，拒绝该协议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叙利亚的重新对抗，而叙利亚此时已成为该协议的主导者和最大受益者。^① 新的残酷现实让真主党放弃无法实现的伊斯兰乌托邦。经过激烈的内部辩论之后，真主党及时调整策略，选择接受黎巴嫩的教派分权制度，并与叙利亚达成一项保护其武器的协议。而伊朗支持力度的下降和国际社会接受叙利亚对黎的主导地位使真主党明白，叙利亚控制着几乎所有黎巴嫩什叶派社区并在黎政坛拥有巨大影响力，没有叙利亚的允许，对以色列的抗争和进一步的发展根本无法实现。真主党也意识到，一旦叙以达成关于戈兰高地的和平协议，大马士革将限制并最终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只有努力扩大群众基础，并在现有政治架构内通过宪政方式拓宽上升空间，才能实现真主党的长久发展。

从叙利亚来看，真主党的价值在收复戈兰高地和控制黎巴嫩的两大战略目标上凸显。叙总统阿萨德很快意识到依靠真主党这样一个武装团体在改善大马士革相对于以色列的谈判地位的价值。^② 一方面，与真主党合作可以使黎巴嫩什叶派民众倾向于支持叙利亚。另一方面，真主党抵抗以色列的行动成果、强悍的军事力量以及伊朗的坚定支持都是其他组织无法比拟的。真主党最终成为叙利亚在黎巴嫩维护利益的最佳代理人，成为“阿萨德手中的利箭”。^③ 1991年马德里和平会议中，真主党的立场使叙利亚在谈判中获益不少，该组织在叙以谈判中得力棋子的价值得以凸显。在真主党看来，“马德里和平会议是阿以冲突的转折点，阿以冲突的核心将从建立国

^① Emile El-Hokayem, “Hizballah and Syria: Outgrowing the Proxy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7, p. 38.

^② Emile El-Hokayem, “Hizballah and Syria: Outgrowing the Proxy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7, p. 38.

^③ David W. Lesch, *The New Lion of Damascus*,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8.

家的问题转为边界和安全问题”。^① 真主党坚决反对马德里会议决议的立场增加了叙利亚的谈判筹码，会议的无果而终也使真主党认定解决阿以问题的出路只能通过武力。而叙利亚也有意挑起真主党袭击以色列的边界行动，目的在于证实真主党拥有武装的必要性和坚持抵抗运动的合法性，叙利亚则通过持续冲突来间接干预黎巴嫩政治。

叙利亚对真主党的暴力行动也进行了约束。“真主党军事打击的规模、频率和时机都必须在总体上与叙利亚迫使以色列谈判这一目标保持一致。”^② 一方面，虽然真主党的暴力袭击会对以色列造成较大伤害，并让国际社会注意叙利亚在该地区的特殊利益，但暴力行动会对期望在西方世界树立良好形象、避免外交孤立以寻求政治支持、经济援助的阿萨德政权产生不利影响。真主党的特殊做法（从劫持人质到自杀行动）对始终保持谨慎和拥有高超手段的叙利亚政府来说很有风险。^③ 另一方面，阿萨德政府也不希望真主党的行动引发以军大规模报复，对以色列的持续消耗是叙利亚政府为避免戈兰高地问题边缘化的措施之一，在可控的范围内约束真主党的军事行动是叙利亚的最好选择。显然，叙利亚对其与以色列的冲突和控制黎巴嫩的战略目的才是支持真主党的基本动因。^④

在政治上，叙利亚极力在黎巴嫩构建权力平衡结构，采取支持什叶派等亲叙力量、打压马龙派等反叙派的策略来实现控制黎巴嫩政坛的目的。在对待阿迈勒和真主党两大什叶派力量的问题上，为抑制真主党过于强大而难以控制，叙利亚选择扶植其竞争对手阿迈勒来限制真主党的影响力，并一直试图保持二者之间微妙的平衡。一个典型事件是，1996 年，真主党要求将 1992 年议会选举时分配得到的 8 个什叶派议席扩大到 13 个，但遭到叙利亚断然拒绝，在叙利亚的压力之下，真主党只能选择重新与阿迈勒结盟。^⑤ 最终，真主党在叙利亚支持和控制的两面政策之下适应并融入黎巴嫩

^① [叙利亚] 肖克：《真实的黎巴嫩真主党》，第 147 页。

^② 李福泉：《从边缘到中心——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第 185 页。

^③ Asad Abukhalil, “Syria and the Shiites: Al-Asad's Policy in Leban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2, No. 2, 1990, p. 15.

^④ Abbas William Samii, “A Stable Structure on Shifting Sands: Assessing the Hizbullah-Iran-Syria Relationship,”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2, No. 1, 2008, p. 39.

^⑤ Graham Usher, “Hizbollah, Syria, and the Lebanon Election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26, No. 2, 1997, pp. 64–65.

政治体制，实现从单纯武装派别向参政党的性质转变。叙利亚也推动真主党淡化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并努力将其塑造成一个政治派别，而不是西方世界定义的恐怖组织。^①

总之，1989~2000年，二者关系处于不对称的联合期。叙利亚在黎巴嫩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与真主党相互利益的需要，使该组织开始适应黎巴嫩社会并进入选举政治，双方开始在政治上展开合作。此时二者关系仍然是不平等的，本质上是彼此借重和相互利用。真主党依然依赖叙利亚的庇护和支持，以防止其武装被解散和继续获得从伊朗经过叙利亚到达黎巴嫩的大规模军事、经济援助。叙利亚也需要真主党改变旧有的伊斯兰单纯武装形态，转为服务于叙利亚利益的黎巴嫩政治力量。

四 平等的伙伴关系（2000~2011）

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哈菲兹·阿萨德的去世和以色列被迫从黎巴嫩撤军后，叙利亚和真主党关系发生重大转变，即由非对称的不平等关系逐渐转向平等的伙伴关系，真主党的独立性不断增强。

首先，以色列撤军使真主党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一方面，撤军释放了真主党长久积累的影响力。2000年5月，以色列从占领18年的黎巴嫩南部撤军，此举被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舆论解释为真主党持续武装斗争的结果。真主党宣称这是黎巴嫩民众坚决斗争和叙利亚大力支持下的必然结果，并在黎巴嫩南部进行了广泛的社会福利活动，这使其在黎巴嫩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民众中的支持率迅速提升。另一方面，撤军使叙利亚和真主党在一定程度上都面临困境，二者需要平等的协商合作。撤军使叙利亚丧失了在黎巴嫩继续驻军的合法性，也使真主党保有武器的重要借口失去依托。经过二者长时间的商讨，叙利亚宣布被以色列占领的原叙利亚领土萨巴农场归黎巴嫩所有，以此达到增强叙利亚驻军合法性并增加真主党拥有武器的理由。于是，叙利亚决定接受真主党为其伙伴，而不是近乎控制真主党。^②

其次，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去世也为真主党进一步松绑。

^① [叙利亚]肖克：《真实的黎巴嫩真主党》，第148页。

^② Mariano V. Ospina, "Syria, Iran, and Hezbollah: A Strategic Alliance,"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1, 2014, p. 30.

年 6 月，哈菲兹去世，其子巴沙尔继任总统，而缺乏丰富政治经验和国内外声誉的新总统迫切需要盟友的支持。巴沙尔打破了父亲对真主党的谨慎态度，与纳斯鲁拉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并确保对彼此的赞美得到了很好的宣传。^① “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的肖像甚至与阿萨德和巴沙尔的肖像一起出现在叙利亚各地。”^② 与真主党继续结盟意味着巴沙尔将继承他父亲的地区政策，仍依靠反美计划来赢得伊朗和真主党的信任，并提醒世界叙利亚不会改变自己的道路。“9·11”事件发生后，尽管真主党希望继续对以色列进行敌对行动，但叙利亚要求其保持克制，担心真主党被美国军方定义为恐怖主义。

最后，伊朗和黎巴嫩政府关系的缓和使伊朗飞机可以直飞贝鲁特，叙利亚失去了从伊朗向真主党输送武器的唯一通道地位。

2005 年叙利亚在黎巴嫩主导地位的丧失和 2006 年真主党赢得对以色列战争的胜利，使双方关系彻底转变为平等伙伴关系。2005 年“哈里里遇刺案”爆发，叙利亚被指控为幕后操纵方，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之下，叙利亚被迫从黎巴嫩撤军，叙利亚此举意味着将失去对黎巴嫩政治和领土的控制，也将失去对真主党的控制。于是，叙利亚将真主党作为继续在黎巴嫩发挥影响的重要抓手，而不是因贪腐失去民心的阿迈勒。真主党由此获得了更多自主权和发言权，成为一个更加重要和独立的组织。一个重大表现是，在哈菲兹时代，真主党对于来自叙利亚的指示，只要不违背其核心利益都基本遵从。而现在二者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已从服从型不平等关系向新型伙伴关系转变。^③ 2005 年 3 月 8 日，真主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再见，但谢谢”的游行活动，并向即将离任的叙利亚情报部门负责人赠送了一支缴获的以色列步枪，感谢叙利亚对抵抗运动的支持。自叙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以来，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常常被视为叙利亚和伊朗政策的延伸。

2006 年，真主党以萨巴农场被以色列占领为由袭击以方边境巡逻队，直接引发了第二次以色列—黎巴嫩战争。真主党依靠丰富的山地战和游击

^① Emile El-Hokayem, “Hizballah and Syria: Outgrowing the Proxy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No. 30, Vol. 2, 2007, p. 42.

^② 李福泉：《从边缘到中心——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第 187 页。

^③ Ohannes Geukjia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Conflict after the Syrian Withdrawal from Lebanon,” *Middle East Journal*, No. 4, Vol. 68, 2014, p. 523.

战经验最终迫使以色列接受停火，这不仅增强了真主党的军事威望，而且赢得了更多黎巴嫩民族主义者的拥护，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的声望达到顶峰。对其支持者来说，这场战争证实了真主党拥有武装的必要性。对批评者而言，这彰显出真主党继续抵抗的危险。而最重要的是，真主党继续拥有武装的合法性就此被黎巴嫩政府和国内各教派力量接受为既成事实。叙利亚作为真主党拥有武器的绝对保护者身份也遭到削弱。真主党不再是叙利亚手中的一张牌，已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和自主权的伙伴。^① 而一直以来，与伊朗不同，叙利亚与真主党的意识形态联系并不重要，伊朗仍然是该组织最高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指导者，这使真主党在新形势下更多地依赖于后者。真主党武装分子也把叙利亚比作戒指，把伊朗比作真主党的手指，戒指可以脱落，也可以随意摘下，而手指只能被砍掉。^②

五 叙内战后真主党的角色转变

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残酷的内战、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极端组织的兴起使巴沙尔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2013年5月，处于被反对派推翻边缘的叙利亚政府受到真主党坚定的入境军事支持，并最终转危为安，逐渐开始收复全国。双方关系更为密切，真主党实现了角色的短期逆转，即叙利亚政府的生存和收复失地离不开真主党的军事支持，真主党成为巴沙尔政权的救命稻草之一。

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对二者联盟关系能否继续保持造成了巨大挑战。这场起初由逊尼派领导的革命对巴沙尔政权和真主党都造成了压力。^③ 当2010年开始的中东动荡在突尼斯、埃及和巴林爆发时，真主党认为这是三国民众对政府以色列政策的一次集体抗议，所以给予了明确支持。但当动荡蔓延至叙利亚时，真主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政策立场。叙利亚内战从爆发之

^① Emile El-Hokayem, “Hizballah and Syria: Outgrowing the Proxy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No. 30, Vol. 2, 2007, p. 44.

^② Augustus Richard Norton, “Hizballah in a National and Regional Context, From 2000 to 2006,”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No. 141, [http://www.palestine-studies.org/final/en/journals/isue.php? iid = 141 &jid = 1 &vid = XXXVI &vol = 203](http://www.palestine-studies.org/final/en/journals/isue.php?iid=141&jid=1&vid=XXXVI&vol=203), 2018 - 08 - 15.

^③ Mariano V. Ospina, “Syria, Iran, and Hizballah: A Strategic Alliance,”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1, 2014, p. 32.

初就彰显出教派冲突的色彩，真主党必须在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维护巴沙尔政权中做出选择。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可维护真主党宣称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并使其在黎巴嫩和中东地区获得逊尼派力量的支持。而支持巴沙尔政权甚至遭到真主党内部人士的质疑和指责，该组织的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对以社会正义和尊重抵抗权利为基础的真主党来说，支持用暴力手段镇压本国人民抗议行动的巴沙尔政权，将对其在整个地区的信誉造成严重损伤。”^①

虽然在叙利亚内战战事胶着的情况下，叙利亚局势难以对真主党产生直接影响，但叙利亚仍是伊朗武器输送给真主党的重要战略通道。理论上，叙利亚可以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 1701 号决议^②的要求切断伊朗对真主党的武器供应。叙利亚政权的变化将直接影响真主党对战略物资和军事武器的获得。^③ 在真主党看来，巴沙尔政权在从伊朗向真主党支援武器、设备和资金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美国等西方国家实现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新的逊尼派政府必将奉行亲西方、敌对真主党的政策，这将使真主党在东地中海地区处于孤立的境地。新政府必然阻止其继续获得储藏在叙利亚的军火，更不必说接收来自伊朗的物资与武器输送。叙利亚武器供应线的失去也将使真主党在对以冲突中处于不利地位。^④ 事实也是如此，2012 年，叙利亚反对派全国委员会（SNC）前主席伯勒姆·加利翁（Burham Ghalioun）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声称：“叙利亚后阿萨德时代的政府将重新考虑与伊朗和真主党的关系，并通过叙利亚中断伊朗对真主党的武器供应。”^⑤ 真主党最终在伊朗的有力影响之下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支持巴沙尔政权。2013 年 5 月，真主党首次承认正在动用武力支持巴沙尔政权，

^① Mariano V. Ospina, “Syria, Iran, and Hezbollah: A Strategic Alliance,”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1, 2014, pp. 33–34.

^② 《联合国安理会第 1701 号决议》是 2006 年 8 月 11 日安理会第 5511 次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协议中要求黎巴嫩政府保障边境和其他入境点的安全，防止武器或有关物资未经其许可进入黎巴嫩。

^③ Augustus Richard Norton, “The Role of Hezbollah in Lebanese Domestic 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42, No. 4, 2007, p. 482.

^④ Daniel Byman, *Hezbollah’s Growing Threat Against U. 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2016, p. 3.

^⑤ Mariano V. Ospina, “Syria, Iran, and Hezbollah: A Strategic Alliance,”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1, 2014, p. 33.

危难时期的叙利亚政府和真主党关系更加紧密。

真主党的参战也实质性地改变了其在二者关系中的角色。在过去 30 多年时间里，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武装力量和任何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受到叙利亚军队的保护、监视和控制，而当前真主党的武装力量已成为除俄罗斯、伊朗以外直接支持叙政府的第三大外部力量。2011~2012 年，真主党的武装力量在叙利亚主要发挥战略咨询和人员培训的作用。从 2013 年开始，纪律严明、擅长山地战和游击战的真主党武装，与叙政府军并肩作战，在库赛尔战役、阿勒颇战役、收复霍姆斯战役、大马士革战役等作战过程中都发挥重要作用。据法国情报部门估计，2013 年 5 月底，3000~4000 名真主党战士在叙利亚活动。^① 而真主党武装也因参与叙内战付出沉重代价。到 2015 年，真主党在叙利亚失去多达 1500 名战斗人员。^② 甚至在 2016 年 5 月，真主党在叙利亚的最高军事指挥官穆斯塔法·巴德雷丁（Mustafa Badreddine）在大马士革国际机场附近被炸身亡。^③ 如果没有真主党如此坚定的军事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取得战役的胜利恐怕要付出更大代价。而真主党参战的直接结果便是增强了该组织的军事力量，并增大其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也使兵员枯竭的叙利亚政府必须依赖该组织的武装力量来收复失地。至少在叙利亚政府完全收复失地之前，二者关系实现了短期逆转。

另外，真主党在黎巴嫩政治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就。2018 年 5 月，黎巴嫩举行议会选举，黎内政部长努哈德·马什努克（Nouhad Machnouk）于 5 月 7 日晚宣布，亲伊朗的什叶派政党真主党及其政治盟友获得 128 个议席中的至少 65 个议席，成为最大赢家。这意味着真主党成为该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纳夫塔里·班内特（Naftali Bennett）甚至在推特上称，黎巴嫩的选举结果“印证了我们一直以来的看法：真主党 = 黎巴嫩，以色列今后不会对二者进行区分，黎巴嫩应为其领土内的任

^① Martin Chulov and Mona Mahmood, “Syrian rebels prepare for showdown in Aleppo,” *The Guardian* (UK), June 14,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jun/14/syrian-rebels-showdown-aleppo-hezbollah>, 2018-08-24.

^② Charlotte Henry, *Hezbollah in 2016: Damaged Goods or Dangerous War Machine?*, Bicom Strategic Assessment, April 2016, p. 3.

^③ “Hizbullah’s Military Commander is Killed,” *The Economist*, May 13, 2016, <http://www.economist.com/news/middle-east-and-africa/21698768-israel-usual-suspectbut-may-not-have-been-responsible-time-hizbullahs>, 2018-08-17.

何行动负责”。^①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真主党力量的增强，也预示着真主党与叙利亚的关系将更加平等。

六 真主党与叙利亚关系的影响

真主党和叙利亚联合的现实状态经受了 30 多年的历史考验，近期的叙利亚内战更是成为二者关系的试金石。这对二者本身、黎巴嫩国家和地区局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真主党而言，无论在其诞生还是发展的过程中，与叙利亚的联合都给真主党带来了巨大收益。首先，叙利亚允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入黎巴嫩扶持真主党，并提供给该组织资金、技术、人员训练方面的帮助，直接推动了真主党的诞生。其次，叙利亚对真主党长期的安全庇护和政治支持解决了该组织保有武器和进行抵抗行动的关键问题，使其在黎巴嫩“站稳脚跟”并实现稳定发展，成功转型为具有反以抵抗组织、合法主流政党、社会福利组织三重身份的黎巴嫩最大政治力量，最终“完成由单纯武装派别向复合型准国家行为体的华丽转身”。^② 最后，真主党受益于当前因叙利亚政权危机引发的地区乱局。一方面，在支持叙利亚政府的军事行动中，真主党不仅获得了宝贵的战斗经验，也在与伊朗和俄罗斯的作战配合中更新了军事战略。真主党对以色列的消耗战略不适合叙利亚战场，现改变为速战速决的新战略。^③ 另一方面，伊朗加大了对真主党参与叙内战的财政和武器支持，尤其是 2015 年签署伊核协议以来，真主党的地区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但真主党的参战行动也遭到国内外各方势力的质疑和指责，服务于叙利亚还是黎巴嫩国家，成为真主党需要时刻辩白的重要问题。真主党多年来精心维护的“泛伊斯兰主义者”形象遭到严重质疑，在国内的政治基础也有所削弱。在地区层面，欧盟和阿盟因该组织参与叙利亚内战支

^① “Bennett: ‘Lebanon equals Hezbollah’ After Election,” *Jerusalem Post*, May 7, 2018, <http://www.jpost.com/Breaking-News/Bennett-Lebanon-equals-Hezbollah-after-election-553659>, 2018 – 08 – 25.

^② 马晓霖：《真主党：搅动中东的超级鲶鱼》，《华夏时报》2016 年 3 月 25 日。

^③ Nadav Pollak, *The Transformation of Hezbollah by Its Involvement in Syria*,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No. 35, August 2016, p. 7.

持巴沙尔政权，先后将其定性为恐怖组织。^①而长期以来，叙利亚支持和控制的两面政策也限制着真主党的反以斗争和地区活动。

对于叙利亚，与真主党的联合是地区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其一，伊朗对该组织的扶持和全面资助以及真主党“不对称战争”的威力都让叙利亚对该组织保持期待，真主党对叙利亚的价值在收复戈兰高地和控制黎巴嫩的两大战略目标上凸显，叙利亚也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达到了目的。二者关系的紧密也进一步强化了叙利亚与伊朗的战略互信。其二，叙危机爆发以来，若没有真主党坚定的入境军事支持，兵员枯竭的叙政府取得战争的胜利要付出更大代价。但叙政府支持真主党的立场也疏远了其在黎巴嫩信奉世俗主义的盟友，激化了叙利亚所面临的地区教派矛盾。真主党进行反以武装斗争的特殊做法也使叙利亚无法真正弥合与西方国家的分歧。在西方世界看来，只有大马士革能够有效限制真主党的军事活动。但在叙政权支持下，真主党力量的不断增强和更加坚决的反以斗争的开展，让西方国家认为只有推翻巴沙尔政权才能结束这种局面。^②真主党因素由此成为西方国家意图更迭叙政权的原因之一。

二者的联合对真主党所在的黎巴嫩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叙利亚对真主党的长期支持使什叶派在黎巴嫩的权力增强、地位上升，甚至成为主导力量，黎巴嫩的国家权威遭到严重削弱，而“真主党与叙利亚的紧密关系也成为什叶派与其他教派和睦共处的重要障碍”，^③这激化了黎巴嫩本就长期存在的教派矛盾，并进一步将地区博弈引入黎巴嫩脆弱的政治结构中。支持还是反对叙利亚的分歧构成黎巴嫩政坛“3·8”联盟和“3·14”联盟成立的最初动因。2014年5月到2016年10月，黎巴嫩总统长期缺位局面的形成就是两大政治阵营斗争的结果。2011年以来因真主党参与叙内战引发的报复性恐怖袭击也时刻困扰着黎巴嫩。2017年11月发生的针对伊朗和真

^① 2013年7月22日，欧盟首次通过决议将真主党武装列入恐怖组织名单；2016年3月11日，在沙特等国家的推动下，阿盟发表决议史无前例地将真主党定性为恐怖组织。参见 Nicholas Blanford, “The EU has voted to blacklist only the ‘military wing’ of Hezbollah, allowing members to continue interacting with Hezbollah’s political leaders,” *Middle East Studies*, July 22, 2013; Yahya Arhab, *Arab League Labels Hezbollah a ‘Terrorist’ Group*, Al Jazeera Center for Studies, March 12, 2016。

^② Daniel Byman, “Should Hezbollah Be Next?,”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6, 2003, p. 56.

^③ 李福泉：《从边缘到中心——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第189页。

主党的“哈里里辞职事件”^①就险些将黎巴嫩推入动荡泥潭。而受真主党与伊朗、叙利亚关系的影响，美国向黎巴嫩政府提供武器援助的重要目的在于压制真主党力量，而不是仅仅为了支持黎巴嫩抵抗恐怖主义威胁。

在地区层面，二者的联合对地区局势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2006 年真主党就在叙利亚的支持下打击以军而引发第二次以色列—黎巴嫩战争。2013 年以来叙利亚在真主党的直接军事支持之下，逐渐取得了叙利亚内战的最终胜利，当前除库尔德人控制的叙东北部之外，仅剩叙西北部的反对派大本营伊德利卜省未被收复。而在沙特和伊朗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教派缠斗持续和美国以遏制伊朗为重点的中东政策的大背景下，二者关系更加紧密代表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联盟的稳固和强大，也预示着叙利亚和真主党将面临域内外国家更多的敌意和挑战，这实际上加深了地区局势的复杂程度。以色列与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特别是在当前以色列、真主党、叙利亚三者的安全互动模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随着真主党军事实力的增强，叙利亚对真主党行动的控制能力减弱，以色列越发对叙利亚境内的真主党武装力量保持警惕和持续打击。而当前伊朗和真主党武装力量对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的靠近，极大挑战了以色列所不能容忍的“安全红线”。戈兰高地很可能成为真主党和以色列下一个对抗的战场。^②

结语

纵观黎巴嫩真主党与叙利亚关系 30 多年的发展变化，整体保持着战略上相互依存的状态：叙利亚需要真主党的帮助以维持其在黎巴嫩乃至中东地区的多方利益；真主党则依赖叙利亚的战略通道和不可或缺的政治支持，在黎巴嫩和中东地区持续扩展影响，不断崛起。此外，伊朗和以色列对二者关系的产生、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从伊朗来看，正是其与叙利亚的利

^① 2017 年 11 月 4 日，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在沙特阿拉伯访问时突然宣布辞职，理由是伊朗对黎巴嫩的控制和对他本人的生命威胁，并指责真主党“是伊朗在黎巴嫩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分支”。“哈里里辞职事件”反映出伊朗和沙特两个地区大国的相互博弈。

^② Nicholas Blanford, “Hezbollah’s Evolution From Lebanese Militia to Regional Player,” *Middle East Institute*, November 2017, <http://www.mei.edu/content/hezbollah-s-evolution-lebanese-militia-regional-player>, 2018-09-10.

益协调，才使真主党从战争苦难中诞生，随后该组织被叙利亚接受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政治上的合作。伊朗也在二者冲突的过程中起到调停人的作用，使双方关系朝着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在叙利亚内战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真主党在伊朗的大力影响下参与叙利亚内战，使该组织与叙政府的联盟关系在新的形势下得到进一步体现和加强，甚至实现短期的角色逆转。而当前伊朗和真主党在叙的军事存在也受到外部势力更多的监视、威胁和打击，这实际上不利于叙利亚政府稳定国内局势和进行战后重建。从以色列来看，其发动的入侵黎巴嫩战争直接促成真主党的诞生，后者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将反以作为自身获得武器合法性和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叙利亚也将真主党作为抵抗以色列和收回戈兰高地的重要棋子而加以利用。二者关系反因以色列的敌对行为而进一步紧密。^① 以色列因素由此成为二者联合的直接动力。这反映出中东局势的错综复杂和各方利益的盘根错节。

地区局势的变化是二者关系演变的永恒变量。其一，巴以问题的解决趋于僵局还是取得进展都直接影响真主党和叙利亚采取斗争的方式。和平谈判还是军事对抗，鼓励还是控制暴力行动，都直接归因于中东结构性矛盾的现实状态。其二，黎巴嫩国内局势和地区热点的变化对二者关系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一个重要表现是，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地位变化以及叙利亚内战导致的巴沙尔生存危机，不仅决定着二者关系的发展方向，也直接影响到双方重点关注的反以行动。叙政府在黎巴嫩地位的削弱释放了真主党长期积累的影响力，也使叙政府放缓了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而重点关注如何维持在黎巴嫩的影响力。当前的叙内战更是直接改变了二者关注的核心目标，维持巴沙尔政府不被推翻成为重中之重，而不是长期进行的反以行动。

鉴于当前叙内战的持续进行，真主党依然活跃在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一线战场，二者关系具有高度稳定性，而这种特殊形势下的依赖关系也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基于真主党所属的黎巴嫩什叶派人口基数相对有限的事实、伊朗和沙特的地缘政治博弈影响和复杂国内外形势，该组织仍然需要叙利亚的庇护。未来叙利亚内战结束之后，二者关系还会发生微妙变化。而真主党力量的增强也意味着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中的政治分量增大，该组织作

^① Daniel Byman, "Should Hezbollah Be Next?,"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6, 2003, p. 61.

为伊朗在阿拉伯世界中内应和抓手地位也愈加凸显。美国、以色列、沙特等反伊力量也将加大对该组织的打击力度，真主党的地区环境实际上在进一步恶化。“哈里里辞职事件”就让真主党意识到必须得到地区盟友的坚定支持。受叙利亚七年战乱波及的黎巴嫩，也急需美国和国际社会提供的贷款和更多援助。这需要已融入黎巴嫩社会的真主党控制其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并更加靠向具有长期合作基础的叙利亚和伊朗。

总之，真主党和叙利亚作为伊朗打造的什叶派联盟的两个重要成员，二者联合的本质是彼此借重和相互利用。双方关系的变化虽然不足以搅动整个地区的地缘关系，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东的和平与安全。只要戈兰高地问题存在、巴沙尔政府不被推翻、教派掩盖下的地区国家博弈持续，二者之间的相互借力关系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这也是以阿以冲突为核心的中东问题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双方关系的演变已经深深植根于地区的结构性矛盾之中，需要持续关注和不断评估。

[责任编辑：申玉辉]